

■ 卿希泰 著

简明中国道教通史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DAOIS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中国道教通史 /卿希泰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7
ISBN 7-220-05541-2

I . 简... II . 卿... III . 道教史 - 中国
IV .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377 号

JIANMING ZHONGGUO DAOJIAO TONGSHI

简明中国道教通史

卿希泰 著

责任编辑	汪 涣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电话:028-6661236, 6669700
印 刷	(028) 6679239
开 本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厂(028-3310879)
印 张	850mm×1168mm 1/32
插 页	8.625
字 数	4
版 次	200千
印 次	2001年7月第1版
印 数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1-3000 册
定 价	ISBN 7-220-05541-2/B·235
	15.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及其酝酿过程 (3)

 第一节 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 (3)

 第二节 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 (9)

 第三节 道教从孕育到诞生的酝酿过程 (18)

第二章 道教在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创建和改造 (26)

 第一节 民间道教在东汉的兴起 (26)

 第二节 道教在魏晋时候的分化与发展 (30)

 第三节 道教在南北朝的改造和充实 (41)

第三章 道教在隋唐五代北宋的兴盛和发展	(51)
第一节 道教在隋代的转折	(52)
第二节 道教在初、盛唐的发展及其空前繁荣，道教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56)
第三节 道教在中、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曲折前进	(80)
第四节 道教在北宋的高涨，道教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89)
第四章 道教在南宋金元至明代中叶的继续发展和变革	
以及宗派的分化与融合	(106)
第一节 道教在南宋统治地区的发展和道派分化	(106)
第二节 新道派在金朝统治地区的兴起	(116)
第三节 道教在元代的繁荣和道派间的合流趋势	(123)
第四节 道教在明初、中期的发展和贵盛道教发展的第三次高潮。“三教融合”的深入发展	(146)
第五章 道教在明后期至清代和民国的逐渐衰落	(164)
第一节 道教在明后期至鸦片战争前的逐渐衰微以及全真龙门派的“复苏”之势	(165)
第二节 道教在鸦片战争后至民国间的进一步衰落及其在民间的日趨活跃	(181)
第六章 道教在建国后的新生和在台港澳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传播与发展	(198)
第一节 道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生	(199)

第二节 道教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208)
第三节 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	(217)
结束语 回顾与展望	(231)
附录一：道教的基本信仰及其他	(241)
附录二：我和道教文化研究	(250)
后 记	(268)

引　　言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其《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对它作了宗教性的阐释。创始时主要流行于民间，并曾同当时的农民起义相结合。魏晋以后，一部分道教徒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扶植、利用，使道教逐渐上层化并与纲常名教观念相结合；在有些朝代还卷入了宫廷政治。而在民间则继续流传着通俗形式的道教，从中还演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在有些农民和平民的起义斗争中，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旗帜与纽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后多编入《道藏》，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音乐、艺术、医学、药物

学、养生学、气功学、化学、天文、地理以及社会心理、社会习俗、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等各个方面均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过一定的贡献，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①，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科学论断。

^① 《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8页。

第一章

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 思想渊源及其酝酿过程

第一节

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

道教之所以在东汉的中后期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体说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使宗教的产生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

中国封建社会由战国进入秦汉时代，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发达的领先地位。但是秦汉社会的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呈现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延展

的趋势。即使在秦汉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也很尖锐。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囚徒）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①。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增多，如何对付农民的反抗，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摆在封建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秦王朝实行严刑峻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企图借暴力镇压来维护其统治，又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梦想由一世至万世，但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覆灭，从而震撼了整个地主阶级，迫使继起的西汉王朝统治者，不能不从中吸取教训，结合实际情况重新判定治国理民的统治理论和策略，实行约法省禁与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以安定社会秩序。于是，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可是这些讲清静无为，重刑名法术，倡仁义道德的说教，都未能防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以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他凭借几代经营积蓄的雄厚资财，连续发起反击北方匈奴的侵扰，开拓西南疆域的大规模战争，扩大和巩固了边防阵地。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空前强盛时期。但是，在这繁荣强盛的画面，却又显现出另一种图景：“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

^① 《汉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册第1137页。（以下凡引二十四史，皆此版本，仅注明册数和页码，不再注明版本。）

(蓄) 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① 富豪兼并土地，横行乡里；官家“争于奢侈”，挥霍无度。这还是汉武帝即位之初的情况。司马迁对此敏锐地指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② 随着沉重的租赋、徭役、以及“贪暴之吏，刑戮妄加”，迫使人民“转为盗贼”，“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③ 社会矛盾日益发展。武帝晚年，“郡国盗贼群起”^④，“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⑤。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西汉王朝也由盛而衰，最后终于灭亡。光武虽然号称中兴，建立了东汉，但东汉王朝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火山上的，本身极其虚弱，只有光武、明帝和章帝三代，皇权尚较巩固，从和帝刘肇开始，政治上逐渐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特别是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以后，一部分沦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农，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更多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在安、顺二帝之后，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宦官和外戚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地方官吏则“贪残专恣，不奉法命，侵冤

① 《汉书》卷 75《夏侯胜传》，第 10 册第 3156 页。

② 《史记》卷 30《平淮书》，第 4 册第 1420 页。

③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8 册第 2515 页。

④ 《汉书》卷 66《王莽传》，第 9 册第 2887 页。

⑤ 《史记》卷 122《酷吏列传》，第 10 册第 3151 页。

小民”^①，致使吏治愈益腐败，搜刮更为猖獗，人民简直无法活下去了，被迫起为盗贼，官军围剿时，竟出现了“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② 的悲惨景象。再加上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疫病流行，以致“死者相枕于路”，“民相食”，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造成人民深重苦难的现实世界，就是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③ 一方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摆脱秦王朝奴役之后，又受到新建汉王朝日益沉重的压榨而痛苦不堪。但他们在当时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十分贫乏，因而既无法避免、也无法理解封建压迫和自然灾害所造的社会不平等与人世苦难，在他们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声张正义，拯救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处境，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祈求神灵的护佑，有接受宗教影响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消弭随时可能发生的反抗斗争，同时还希望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的统治祈求长治久安和个人的益寿延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宗教的产生，就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

① 王符：《潜夫论》卷1《务术》，《潜夫论笺》第68页。

② 《资治通鉴》卷55《汉纪四十七》，中华书局标点平装本，第4册第1781页。以下凡引此书，皆此版本，仅注明册数和页码，不再注明版本。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二、汉代统治思想的宗教化，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上所述，秦王朝的覆灭，表明了单靠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并不能治国安民、解决社会矛盾；汉初奉行黄老之术，虽然使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但也未能防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以致到汉武帝时，又面临“盗贼群起”、农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胜数”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汉代统治者借鉴历史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① 的经验，企图借助鬼神的威力，加强“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以使黎民百姓成为规规矩矩的顺民。《淮南子》明确主张“因鬼神机祥，而为之立禁”，“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②。汉武帝更是身体力行，他即位之后，“尤敬鬼神之祀”^③，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祠神求仙活动。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政权的需要，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也应运而生，并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他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④。认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都是由这个“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⑤。当帝王的行为体

① 《易·观卦·彖辞》。

② 《淮南鸿烈解》卷 20《汜论训下》，《道藏》第 28 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8 页。（以下凡引《道藏》，皆此版本，仅注明册数和页码，不再注明版本。）

③ 《史记》卷 12《孝武帝本纪》，第 2 册第 45 页。

④ 《春秋繁露》卷 15《郊义》。

⑤ 《汉书》卷 56《董仲舒传》，第 8 册第 2502 页。

现了天意，积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反了天的意志，有了过失，天就降灾并警告他，让他改过；如果屡告不改，就要受到惩罚。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宗教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后即一直纵贯于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董仲舒不仅是一个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宗天神学家，而且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这一著作中，不仅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和儒家经义，而且还创造求雨、止雨仪式，登坛祈祷作法，弄神说怪，简直分辨不出他是儒生还是巫师或道士，表明儒学已经宗教化，儒生与方士已开始合流。以董仲舒为前导，在汉王朝的支持下，谶纬之学逐渐兴起。“谶”，是假托神意制造的一种预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①，源出巫师和方士，由来已久。“纬”是以神意来对儒家经典进行的解释，把儒家六经宗教化，把孔子打扮成超人的教主。二者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就其宗教神秘主义的实质来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遂与谶合而为一”^②，合称谶纬之学。西汉末年，这种谶纬之学极为盛行。汉光武帝刘秀即是靠图谶起家，即位之后，更是对它加以大力提倡，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之学，于是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气氛之中。这种气氛显然是孕育道教的重要土壤。再加上佛教在汉代的传入，给某些神仙方士创立宗教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经部·易类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47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经部·易类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47页。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成为道教产生的助产剂。但道教的出世，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孕育的结果，即使没有外来宗教的影响，它也会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产生，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节 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

上面所说的这些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仅是说明道教赖以产生的气候和土壤，有了这种气候和土壤，还必须要有种子，没有这个种子，道教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凭空产生。道教既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它的种子来源便只能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它的思想渊源。

道教的思想渊源是“杂而多端”的，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道家思想。道家和道教，本来是有区别的。先秦道家乃是先秦时候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则是东汉时候形成的一种宗教。但二者也并不是毫无联系的，道家哲学乃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属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不同的人可作出不同的解说。在《庄子》书中，更把道解释成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禹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①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长生久视、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吸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③。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④，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道教还把老子看作是道的化身，这种思想在道教正式产生之前就有了。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其中便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⑤把老子与道合而为一。道教继续发挥了这种思想，《太平经》说：“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周流六虚，

^①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庄子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6—247页。

^② 司马承祯：《坐忘论》，《道藏》第22册第896页。

^③ 《妙门由起序》，《道藏》第24册第721页。

^④ 吴筠：《玄纲论》上，《道藏》第23册第674页。

^⑤ 裴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年版。

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① 传为张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一说为张鲁所作）中，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② 其后南宋谢守灏所编撰的《混元圣纪》、《太上老君年谱要略》、《太上混元老子史略》等著作中更反复地说：“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经历天地，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其随方设教，历劫为师，隐显有无，罔得而测。然垂世立教，应现之迹，昭昭然若日月。”^③ 又说：“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万道之宗，乾坤之根本，天地之精源。”^④ 又引唐尹文操的话说：“老子者，即道之身也，迹有内外不同，由能应之身或异也。”^⑤ 并称他“秉生成之柄，镇造化之原，故在天为众圣之尊，在世为万教之主。谓之老子者，道之形也，应既不一，号亦无量，或三十六号，或七十二名”^⑥。于是老子与道在道教中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因此，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拜老子亦即崇拜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的核心，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开展的。“道教”的命名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是道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思想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乃是它的理论基础之一。《魏书·释老志》在说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便说：“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

^①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页。（以下凡引此书，版本皆同，仅注明页码，不再注明版本。）

^② 耿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1956年版，第13页。

^③ 《道藏》第17册第780页。

^④ 《道藏》第17册第895页。

^⑤ 《道藏》第17册第805、900页。

^⑥ 《道藏》第17册第795页。

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① 这里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道教。正因为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与道家老子确有某些历史的渊源关系，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家。

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这种黄老之学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但又吸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是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后来，黄老养生之术演变为道教的修炼方术，奉黄老术的黄老道家便是道教的前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曾作过这样的评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黑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② 他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黄老术的新道家。司马谈的这种观点，被东晋道士葛洪所采用，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明本》中，正是依据司马谈的这种观点，从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阐述了他的道本儒末，道高于儒的思想，以为道家之教“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主张“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吸收各家之长，来建树其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在修道方法上，他也主张“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

^① 《魏书》卷 114 《释老志》，第 8 册第 3048 页。

^② 《史记》卷 130 《太史公自序》，第 10 册第 3289 页。